

澳門文學概念的層次論析

朱壽桐*



澳門文學概念可從不同層次加以論證和把握。

第一個層次是有與無。澳門當然有文學，而且澳門文學的內涵還相當豐富。

第二個層次是一般與特色，即澳門文學是否有特色。澳門文學從取材到風格上都具有明顯區別於其它鄰近地區文學的特色。

第三個層次是澳門文學是否能構成優勢資源。澳門文學的特定生態是中國文學乃至整個漢語文學中非常值得珍視的對象。綜合以上三個層次，澳門文學的概念在學術上是成立的。

是否應該有“澳門文學”這個概念，是討論甚麼是澳門文學的基礎性問題。不同的論者對這個問題的解說大有不同。許多論者認為“澳門文學”是一個自明性的問題，既然澳門有文學寫作，就應該有“澳門文學”。但也有論者對此持懷疑和否定態度。⁽¹⁾ 本澳的懷疑論者或許出於自謙，或許出於意氣；澳門以外的懷疑論者或許出於隔膜，或者出於偏見。是否確認以及如何認知“澳門文學”概念，這是一個無須統一也無法統一的問題，而且一旦統一起來立刻就意味著很不正常。在眾說紛紜之中，或許可以從不同觀念

和理論層次來理解和界定“澳門文學”概念，以期對這一概念的把握有一個逐層分明的效應，以期在這一概念的理論把握上形成一個較為系統性的觀念框架。

實有與空無層次的辯證

澳門有沒有文學與有沒有“澳門文學”，這是兩個雖有不同理論層次但無疑是相互關聯的問題。一個特定的區域祇要有文學創作，有各種文學活動和文學運作現象，包括文學寫作⁽²⁾，文學

* 朱壽桐，江蘇鹽城大豐縣人。1979-1983年入讀蘇州大學中文系，1983年進入南京大學中文系修讀碩士研究生課程；1990-1991年在北京大學任高級訪問學者；1993年12月在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1986-2004年在南京大學中文系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所副所長；2001-2002年在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任訪問教授；2004-2007年在暨南大學任珠江學者特聘教授、現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至今在澳門大學中文系任教授。



出版乃至於文學閱讀等等，這些現象的綜合未始不可以命名為總體上的該區域的文學。澳門歷來就有文學創作，更有各種各樣的文學現象和文學運作，綜合這些因素，就可以理所當然地概括為“澳門文學”。

誠如否定“澳門文學”的言論常常帶有某種“意氣”一樣，毋庸諱言，“澳門文學”的提出最初確實也帶有某種意氣。韓牧明確表示，他在1984年提出“澳門文學形象”的時候，就有“為澳門文學界爭地位爭氣和打氣”的意味。⁽³⁾這樣的意氣在觀念倡導時期往往是免不了的，其作用一般來說也較為積極。但觀念倡導塵埃落定之後，理性的論析變得十分重要。儘管“澳門文學”的否定論者、懷疑論者仍然帶着一定的“意氣”。——事實上，否定論者、懷疑論者帶有某種意氣對類似於澳門文學概念發難或質疑之時，那“意氣”常常不可避免。韓牧回憶道，甚至於1970-1980年代之交，香港也還在討論“香港有沒有文學”的問題。⁽⁴⁾“澳門文學”概念的論析卻必須遠離這種非學術的態度。

當我們探討是否應該有“澳門文學”概念或者名詞的時候，我們可以先將論述的層次放在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上：澳門是否有文學？回答當然是肯定的。澳門不僅有文學，而且文學現象還相當豐富。澳門有悠久而輝煌的文學歷史，也有着活躍而生動的文學現實。在澳門的文學現象中，有成就顯著的文學創作，也有風格多樣的批評本體寫作；有高潮迭起風雲際會的文人雅集，也有充滿迷惑力的文學想象。這些組構成“澳門文學”，可謂多姿多彩，幾乎能以某種眩惑的模態宣示出它自身的實有而非空無。

澳門由於特定的政治地理、文化地理和空域地理條件，每當時代發生巨大動盪，就會吸引一批來自不同地域的文學家和文化人來此避難或圖謀發展。清代初年，素有“廣東徐霞客”之稱的屈大均（1630-1696）曾多次居停澳門，圖謀反清復明大業，留下了諸如“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外國頻挑釁，西洋就伏戎。兵愁蠻器巧，食

望鬼方空。肘腋教無事，前山一將功。”（〈澳門〉）等充滿英雄氣和民族情的詩篇。在此，他還跟西洋人“郭丈”有過密切的交往，其中應蘊含着不少中西文明交流碰撞的佳話。清初著名畫家兼詩人吳歷（1632-1718），也曾由吳中覓跡粵澳，為後來的澳門文壇留下了《三巴集》、《澳中雜詠》等詩集。清末在澳門二龍喉張園興起的“蓮峰陶社”，也是一群落難文人的雅集酬唱之所。曾任全台義軍統領率義軍與日本侵略者血戰的英雄詩人丘逢甲（1864-1912），在喪權馬關之後至辛亥革命期間頻頻出沒澳門，聯絡戊戌維新君子，支持同盟會活動，留下了“誰報兇酋發塚冤？寶刀飲血月黃昏。要攜十斛葡萄酒，來酹秋原壯士魂。”（《澳門雜詩》第十二吟）等“壯心不已”的烈士之歌。進入民國以後，南來過往的文人有慣寫“澳門竹枝詞”的汪兆鏞這樣的詩人和寫有《澳門雜詩》的黃節這樣的學者詩人，更有其他類型的文人如小說家、散文家、戲劇家、電影藝術家、美術家等，如茅盾、夏衍、張天翼、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郁風等⁽⁵⁾，他們由於各種機緣（遊歷、訪友、戰亂中的逃亡、遷徙）來到澳門，留下了許多值得珍視的作品。黃榮康的〈寄黎澤闓澳門，兼柬高劍父、張純初、凌巨川、李供林、張白英〉以及〈李供林與張純初、黎澤闓、高劍父、凌巨川、張白英澳門讌集，以詩轉港，子祥見寄，賦答一首〉，從詩題即可見抗日期間戰亂時節澳門“讌集”之盛。

著名小說家郁達夫1926年冬曾由香港到澳門小住，並以此行為背景寫下了現代文學史上的名篇〈過去〉。從文學史的宏觀意義上說，當文壇處於“方向轉換”的關鍵時刻，智識分子和文人中普遍唱響的是“到兵間去，到民間去，到革命的漩渦中去”的呼聲；文學寫作也是如此，出現了大量批判個我，批判私情，而宣揚革命和時代的作品，包括郭沫若的〈一隻手〉、巴金的〈滅亡〉等，也包括後來被批判為“光赤色的陷阱”的作品。這樣的作品常常以假想代替生活，徒有高亢的熱忱，實則是空洞、乏味或虛假。在這種



情況下，特別是在創造社內部，類似於〈過去〉這樣的私人情感的表述就顯得彌足珍貴。從郁達夫個人創作的微觀方面言之，則是他情緒更新、私情蕩滌的轉軌之作。在此之前的創作，郁達夫為將自己置身於靈肉衝突的矛盾漩渦之中，然後肉的慾望佔據上風，從〈過去〉開始，作者通過人物的表現，使靈的提昇戰勝了肉的慾望，並且得到情緒的解脫。因此，無論就現代文學史還是郁達夫個人的精神史而言，〈過去〉都是值得重視的小說。這樣一篇小說將情節的場景放在澳門，使得澳門第一次作為正面場景出現在中國現代敘事性的虛構作品之中，這是非常值得紀念的文壇佳話。

澳門文學不僅有作品、有運作、有鐵一般的歷史事實，而且還有迷離的文跡想象。許多人願意將澳門文學的起點與湯顯祖來澳並作〈香奩逢賈胡〉、〈聽香山譯者〉諸詩的傳說聯繫在一起。湯顯祖研究專家徐朔方曾言之鑿鑿：“（萬曆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湯）從廣州舟行到香山岙，即今澳門。”⁽⁶⁾有論者稱，湯顯祖遊歷澳門所撰詩章，“這是澳門詩詞史甚或文學史開卷之篇章”⁽⁷⁾。從〈香奩逢賈胡〉這首詩的題名即可判斷，湯顯祖到過澳門的可能性極大，但迄今未發現非常有力的直接證據證明這一點。不過無論如何，這位偉大的文學家與澳門有關，澳門的風土人情引起了他的關注，並且進入了他的經典性寫作，這些就足以令後人在想象中將湯顯祖與澳門和澳門文學聯繫在一起，歷史性地賦予了澳門這種關於湯顯祖的想象的權力。

另一個文跡想象的主人公是世界偉大的文學家、葡萄牙詩人賈梅士（Luís de Camões, 1524-1580）。傳說這位偉大的詩人於1556年來到澳門，在此勾留兩年，甚至與一位中國姑娘產生了戀情，同時在這裡寫出了包括其代表作《葡國魂》在內的一些詩歌作品。如果此說準確，則賈梅士比湯顯祖來澳門的時間提早了三十六年，而且確曾在這裡寫作，澳門文學的起點因之也應提前三十六年。儘管賈梅士在澳門的歷史文跡仍有待考

證，但善良和大度的澳門人已經將白鴿巢這一極富詩意的地名交付給了賈梅士。

湯顯祖、賈梅士是否或在甚麼時候在怎樣的情況下來過澳門？他們是否在澳門寫作過與其傳世之作密切相關的作品？這些事實都可以存疑，因而，他們的相關作品也都可以從澳門文學的基本框架中暫且擱置，但有關他們的文跡想象確乎是澳門文學的一種價值資源，是澳門文學的合理組成部分。一個區域的文學不僅僅是該區域文學創作的統稱，還應該是這個區域所有文學運作及其相應現象的總和。關於著名文學家的行跡想象，在得到確證以前，可以視為一種影響力很大的民間文學想象，是一種民間的文學運作，應該理解成該區域文學的當然現象。澳門關於湯顯祖、賈梅士的行跡想象，正是給澳門文學添加了儘管撲朔迷離但卻非常美好的內容。

這樣的文跡想象在得不到證實的情況下之所以可以視為澳門文學的當然內容，所取的乃是相關性原則。對於澳門這樣一個地位獨特、文化獨特而空域狹小的對象而言，任何具有相關性的因素都可以納入其總體概念之中進行把握。澳門文學的總體概念需要引進這種相關性理念。既然湯顯祖、賈梅士的文跡想象與澳門相關，它就成了澳門文學的一個特別的話題。在這種相關性意義上，還可以計入聞一多那首影響巨大的〈七子之歌〉。作者與澳門沒有直接關係，但他歌吟出了與澳門相關的歷史和現實，而且影響卓著，正可以以相關性原則納入澳門文學的視野之中。

一般與特色層次的論證

任何一個區域都會有各種各樣的文學現象，但並不意味着任何區域都擁有區域文學的概念。一個總體性的概括和一個學術概念的命定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名詞。怎樣才能使得一般性的總體概括上昇為概念性的學術命名？必須揭示這一概念特有內涵的獨特基色。“澳門文學”不僅有豐富的內涵，而且這樣的內涵在更高的層次上富有特



色。這是“澳門文學”作為學術概念得以成立的關鍵。

令人欣慰的是，無論是“澳門文學”的懷疑者還是倡言者，都能在這樣的理念層次上展開他們的疑問和論證。據韓牧介紹，質疑“澳門文學”提法的“青年朋友”反問他：“澳門有些甚麼文學？”“那些作品有些甚麼特色？”“和香港文學有甚麼分別？”⁽⁸⁾雖然這種連珠炮似的提問明顯帶着對澳門文學的偏見，但其透露的學術理念卻非常正確。“澳門文學”作為學術概念就需要標示澳門文學的特色，以期與香港文學、內地文學作基本區別。如果“澳門文學”在內容、風格和做派上不過是內地文學和香港文學的自然延伸和簡單複製，作為概念的“澳門文學”就沒有必要存在，祇需要用類似於“澳門的文學”之類的名詞加以概括即可。也許正因如此，韓牧最初倡導建構的不是“澳門文學”概念，而是“澳門文學的形象”，其表現態度非常審慎：避開嚴肅的概念命名，而祇是做出一種現象概括甚至祇是一種良好的期望。相比之下，後來倡言“澳門文學”的資深論者，包括澳門文學事實上的掌門人李成俊、李鵬翥，對此都顯得更為胸有成竹。他們意識到“澳門文學”不應是空喊的概念，必須揭示其富有特色的文化內涵和文學內涵。李成俊最初把握“澳門文學”就是從其鮮明的特色着手的。他認定：“澳門文學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同反抗異族的壓迫相結合。”⁽⁹⁾在這樣的歷史判斷和價值判斷之下，他揭示了普濟禪院清初的文學功業，魏源、鄭觀應在清末對國家興亡、民族危亡的痛心反思，以及抗日戰爭期間澳門此起彼伏的文學運作。概括和把握澳門文學的歷史特徵也不是一件十分繁難的事情，但當澳門文學概念尚在最初的建構、探討和爭議之時，論者便意識到需要充實以澳門文學特色的學術總結，這反映了可貴的學術自覺和理論敏感性。

在揭示了澳門文學的歷史特徵之後，倡言者對於“澳門文學”概念的把握有了足夠的理論底氣，於是，李鵬翥由衷地表示：“對於澳門文

學，我自以為是個樂觀主義者。”⁽¹⁰⁾他的樂觀還建立在對澳門文學現實觀察的基礎之上，儘管他也觀測到澳門作為文學的百花園，“水不很充沛，土不很肥沃”，但堅信祇要“有人播種，有人耕耘”⁽¹¹⁾，就能開出優美的花朵，就能結出燦爛的果實。

澳門文學的發展確實存有許多不利的因素，但這種不利因素有時候會轉化為一種澳門特色，也就是澳門文學的特色，從而為澳門文學概念的學術成立夯實基礎。例如，許多論者注意到，澳門（當時）缺乏專業性的文學出版機構和文學雜誌平台，也缺乏相對專業的寫作者隊伍。李觀鼎甚至概括說，作為一個地域性的文學現象，澳門文學早就形成，並且已經擁有了自身的特徵，那就是它的“非專業性”（即李觀鼎教授對澳門文學批評所概括的“業餘性”）⁽¹²⁾。確實，澳門的各路文學家一開始就疏離了文學專家化的路數。文學寫作普遍成為澳門文人抒發情趣、表現心境、展露才情並以之娛己悅人的一種表現方式，甚至是一種生存狀態。於是，非專業化並不意味着寫作隊伍的蕭條。有人統計，澳門就人口比例以及每平方公里所擁有的詩人量而言，詩人的密度應為全球最高。《澳門現代詩刊》發刊辭披露：“据初步統計，澳門面積目前不到十八平方公里，而幾乎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兩位寫現代詩或新詩的文學好事之徒了，而且其中有一半乾脆可以稱為澳門詩人。”⁽¹³⁾現在的澳門面積遠遠不止這個數目，而文學寫作者哪怕就是詩歌作者更不止這個比例。

當人們發問“和香港文學有甚麼分別”時，對於澳門文學特色的漠視溢於言表，其中多的是隔膜與偏見。從創作方面言之，澳門文學體現的澳門文化關懷、澳門人生關懷、澳門社會關懷甚至澳門心理關懷的特色遠遠超過香港等地的區域關懷，無論是散文還是小說抑或戲劇，澳門文學在澳門題材意義上的建樹，其成就不僅屬於澳門，更屬於中國當代文學以及世界華文文學（也就是漢語新文學）的奇觀。相對而言，詩歌的題



材感特別是題材中的地域感往往較弱，因此，探討澳門詩歌中的區域特色及其題材意義得出的結論並不十分可靠。但其它文體的澳門題材考察十分有價值。澳門的小說創作本來不是澳門文學的重鎮，但有影響的小說幾乎都在特殊的澳門題材方面長袖善舞，這包括飛歷奇後來被拍成電影的《大辦子的誘惑》，也包括享有同樣殊榮的廖子馨的《奧戈的幻覺世界》，它們都非常突出地展現了澳門本土題材的文學魅力。澳門文學獎選拔出來的小說，幾乎所有作品的題材或場景都與澳門相關。以《澳門筆匯》第40期刊載的第八屆澳門文學獎小說得獎作品為例，冠亞季軍的作品完全離不開澳門的“小城”敘事：或者討論“先為小城找工作”（陳兆卿：〈一隻小馬——一個士兵騎在上面的一隻塑膠小馬〉），或者交待首都B城“距離我們家鄉那小城二十二小時的火車車程”（林小雯：〈小可〉），或者乾脆就寫“澳門是一座不夜城，也是一座喜歡睡懶覺的城市”（初歌今：〈泊之東鄰〉）。所有的敘述離不開這個富有特色和魅力的小城，以至於評判委員丁啓陣發現：“澳門人的性格、言談，大多謙讓、內斂，喜歡以小城人‘自居’……”⁽¹⁴⁾ 其實澳門小說的寫作也大致處於這樣的格局。澳門散文寫作大多圍繞着澳門現實或者故事展開議論，林中英的大量作品往往就在描畫澳門，並展述自己對澳門的深深情愫。即便是遊記散文，也常常與故地小城的情景連綴起來加以敘寫，沈尚青在這方面表現最為突出。澳門的戲劇舞臺可能會上演海外劇作，但如果是本地的創作，其題材一定聚焦於澳門風光和澳門風情，李宇梁、周樹利等都是這方面的執着的堅持者。可以說，在整個漢語文學世界，沒有一個區域像澳門這樣，作家們的創作熱忱幾乎完全聚焦於自己的小城故事，他們的創作之火似乎祇接受小城文化作為燃料，而小城澳門也正需要這樣的火光為之燭照。

澳門文學無論是創作隊伍的構成，還是創作心態的形成，無論是歷史概貌的呈現，抑或是創作題材的開闢，都體現出鮮明強烈的地域特色和

文化特徵，這樣的個性不僅不同於香港文學，而且在整個漢語文學世界也佔有突出的地位。澳門文學以如此顯著的特色，與一般的漢語文學拉開了較大距離，成為漢語文學世界非常典型的區域個案。對這樣一個特殊的個案，進行“澳門文學”的學術命名和概念認定其理由非常充份。

優質與劣勢層次的尋證

一個區域的文學是否有價值，是否值得做學術性的概念命名和論證，並不是光看其是否有特色，更要看這樣的特色是否體現出一定歷史、時代的優質資源。澳門文學不僅是富有特色的區域個案，而且在整個漢語文學發展的格局中，還是一個提供了優質資源的區域個案。

我在許多場合下進行過這樣的認證：澳門文學雖然沒有產生在漢語文學世界卓有影響的作家作品，澳門文學迄今沒有成功地推出屬於自己的文化英雄，這個英雄本應能夠成為漢語文學世界的一個重大典型，一個精神資源，一個常說常新的話題，一個具有普遍學術價值的研究對象。然而，澳門文學形成了獨特的文化生態，這樣的文化生態為漢語文學整體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研究範例。

屬於澳門文學的富有特徵的文化生態首先體現在和諧共生的局面。一方面是新舊文學的和諧共生，另一方面是不同語言文學的和諧共生。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新文學總是在與舊文學相抗衡、相對立，至多也是相砥礪的狀態下艱難地成長，執拗地發展，而舊文學的地盤越來越小，最後為新文學逐漸邊緣化，兩者之間基本上形成了海水衝擊河水的對壘互斥情狀。在內地和臺灣的諸多情形下，這樣的情狀不僅沒有消除，而且一度還呈現愈演愈烈的局面。在香港等新舊文學對壘不太明顯的後發文學現代化區域，舊體文學與新文學之間基本上祇能保持井水與河水互不干犯的狀態：新舊體文學各擁有自己的陣地，擁有自己固定的作者和讀者群，展開互不相擾的文學活動。祇有在澳門，新舊文學達到了和諧共生的



理想格局，其間的關係譬如河水與湖水一樣相容無礙。在這片平和的文學樂土之上，不僅新舊體文學之間基本上沒有衝突和論爭，而且新舊體文學的寫作者還常常能一起切磋，相互激勵，渾然構成一個和諧的整體。在澳門，同時寫舊體詩歌又同時關注並寫作新文學的作者相當普遍，新舊體文學的融合在這個健康的文學世界形成了某種藝術文化共生關係。這是漢語文學發展較為理想的境地，這樣的理想在澳門文學特定生態中得到了實現。可見，澳門文學生態代表着一種優質的文化現象和文化典範。

澳門文學在新舊文體領域形成的這種河水與湖水兩兩相融的關係，雖然並沒有產生出特別引人注目的作品，但為漢語文學糾結了一百年的世紀難題提供了自然的解決路徑。事實證明，新舊文學各有其勢，各有其根，任何試圖像海水衝擊河水那樣以一方吞噬或排斥另一方的努力，最後都祇能導向片面和偏激，於民族文化的健康發展無益；井水不犯河水似的各守其城，各行其道，各自保持文體和語言的“純粹”，不僅事實上並不可能，而且也十分不利於文化和文學的健全發展。既然新舊體文學都是漢語文學世界不應偏廢的奇葩，它們都擁有各自的價值，兩種價值相融合則更能產生發展和健全的動力。澳門文學生態展示了兩種價值力量相融合的可能性。

其次，澳門是一個多民族雜處的社會，特定的歷史形成了漢語與土生葡語交相輝映的和諧共生局面，這樣的語言局面在文學創作上得到了同樣的呈現。澳門土生葡語話劇在漢語文學世界也得到了普遍的承認、積極的評價甚至是贊譽，土生葡語文學也融進了相當豐富的漢語語彙和華人的生活資訊。這樣的局面使得澳門文學的和諧共生生態有了立體的發展，有了健全的風貌。民族文化和諧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國際社會和國際學術界特別關注的焦點，澳門通過文學向世界呈現出一種現實的可能性。

由於澳門文學遠離了職業化的運作，同時也遠離了市場化的衝擊，甚至在一定意義上疏離了

名利場的誘惑，澳門雖然缺少經典性的文學運作力度，缺少經典性的文學影響力，但澳門文學近乎文學原生態的運作形態和方式，就成了漢語文學乃至整個時代文學特別富有理論啟發性的學術資源和文化資源。澳門的文學寫作者具有較為普遍的性情化寫作的心態，這種性情化的寫作排斥了市場運作對文學的可能干預，也基本上規避了政治和其它意識形態硬性鏤入的可能，保證了寫作者在祇忠於自己的性情或祇為自己的才情服務的寫作熱情及其獨立性。文學創作在澳門從來就不是殿堂之上的寶器，而是流寓於民間的習見之物，文學寫作的門檻之低乃體現為一種文化的常態。由於出版的相對自由，稍有文字功底的人皆可以在這片狹窄的土地上做起自己的文學之夢。

在文學傳播學和文學社會學的意義上，澳門擁有高度自由的寫作發表環境，擁有強有力的政府或社團支持，文學寫作者在自然人口中所佔的相對高比例，營造了一派充滿自然意味的文學生態。在這裡，文學的生息狀態是如此地活躍而自由：手段高超的文學寫作者與鋒芒初試的文學自習者經常一起出現在各種媒體，堪稱優秀的文學作品與相對粗糙的文學習作也有較多機會不期而遇。他們的文學寫作在許多時候，就類似於在澳門這個極其有限的文化世界中作一次率性的漫遊，猶如茶餘飯後到議事亭前地作一次愜意的散步，任何藝術層次的文學作品都能夠在這樣的一派自然生態中融入進去，許多作品都祇是進行一般化的描寫和議論。無須指責這種非常一般化的文學寫作，它們畢竟構成了澳門這片文學熱土的基本熱力，構成了澳門文學生態的自由、平和而清新的基色。在這裡，中小學生的作品也可以編輯成文學專集，《小豆芽》⁽¹⁵⁾等便是明證；諸如《鏡海詩刊》這樣的學生詩歌刊物雖然維持困難，但還是時露崢嶸。這不僅不能說明澳門文學的劣等品性，反而可以視為澳門文學的優質性狀的體現。文學的原生態本來就不是為文學職業者、經典文學家和文化精英階層準備的，文學本來應該是廣大民衆和寫作愛好者表達自己性情與

才情的文化品類，於是最原生態的文學往往都是民歌民謠和民間故事，所有這些原生態作品都不是為進入經典的殿堂而準備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澳門文學的生態事實上更接近於體現文學的原生態意義。在這種原生態意義上發展起來的澳門文學，也許不能為漢語文學提供足以令人滿意的個體文本，不能在文學經典化運作的歷史進程中留下燦爛的篇章，但它的文化標本價值也許更大。它蘊藏的文化標本意義也許並不下於大三巴等世界文化遺產。

文學的價值到底在於“優選”經典還是在於一般人生的怡情悅性，這確實是個問題。人們所習慣的文學歷史和文學理論闡析，總是將價值的肯定面傾斜於前者，幾乎對於每個民族每個區域每個時代的文學都聚焦於那些經典的影響巨大的作家作品，在一定的歷史範疇中想方設法論證其地位和價值。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的研究實際上都是在做歷史的和美學的“優選法”工作。一種更富有挑戰性的理論思維則應該關注後一方面：文學的原初形態和本然的社會意義原本與經典性的運作無關，它來自於普泛的人生，表現普泛的人生，同樣也怡悅普泛的人生。無論在寫作環節還是在傳播和接受環節，自由參與者越眾，其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越高，在此意義上甚至可以忽略文學教科書上通常強調的文學價值。文學的出現、文學的發展和繁榮程度一方面可以從文學評論家最耳熟能詳的文學價值角度進行判斷，另一方面也可以從文學生態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進行評估；後者越出了文學本身，卻能夠在更為宏大的坐標系中確認文學的屬性。這是澳門文學特定生態給予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研究的一種啓迪。循着後者一種認知思路，澳門文學生態具有典型的文學社會學價值以及健康的文學文化學意義，是一種應該引起漢語文學界以及一般的文學理論界特別注意、特別重視的文學現象。

面對澳門文學這樣的生態、這樣一個特定的個案、這樣一個很容易被人們忽略的優質資源，我們所要檢討的是理論的呆板和滯後。祇有在這

種呆板和滯後的理論框架內，我們對澳門文學的審視才會那麼悲觀，才會充滿疑慮。

“澳門文學”的概念將拒絕疑慮，在上述三個層次上得到理論的確證。在實有與空無的層次上，肯定的回答是澳門有文學，它們是“澳門文學”的基本內涵，雖然它的外延劃定可以作彈性處理。在一般與特色層次上，可以認定“澳門文學”確有自己的特色，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這是澳門文學足以區別於其它文學的重要依據。在優質與劣等判斷的層次上，應該看到“澳門文學”的特色中具有社會文化意義上的優質資源，澳門特別的文學生態甚至對呆板、滯後的文學理論來說意味着一種挑戰。因此，“澳門文學”現象或許是簡單的，但把握“澳門文學”需要較為複雜的理論框架。

【註】

- (1) 韓牧在〈為“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再發言〉一文中提到，一位青年學者就認為“澳門文學”這個名詞“不成立”：“澳門有些甚麼文學？”見李觀鼎主編：《澳門文學評論選》，頁9，澳門基金會，1998年。其實，直到前些年，關於澳門沒有文學的懷疑論仍然出現於一些學術會議上。
- (2) 文學行動理論認為文學創作屬於創作本體，而文學家從事的非文學的批評性寫作屬於文學的批評本體，它們是與文學創作完全不同但仍然屬於文學的寫作行為。參見朱壽桐：〈論中國現代文學的批評本體形態〉，《文藝研究》2006年第9期。
- (3) (4) (8) 韓牧：〈為“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再發言〉，李觀鼎主編：《澳門文學評論選》，澳門基金會，1998年，頁9；頁2；頁26
- (5) 參見李鵬翥：《濠江文譚》，澳門日報出版社，1994年。
- (6) 徐朔方：《湯顯祖評傳》，頁78，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 (7) 施議對：〈澳門舊體詩詞創作〉，《今詞達變》（施議對詞學論集第二卷）澳門大學出版中心，1999。
- (9) 李成俊：〈香港·澳門·中國現代文學〉，李觀鼎主編：《澳門文學評論選》，澳門基金會，1998年。
- (10) (11) 李鵬翥：〈澳門文學的過去、現在及將來〉，李觀鼎主編：《澳門文學評論選》，澳門基金會，1998年，頁33；頁34，
- (12) 李觀鼎：《澳門文學評論選》〈序〉。p.v.,
- (13) 見黃曉峰：《澳門現代藝術和現代詩評論》，頁234，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
- (14) 丁啓陣：〈澳門文學路在何方？〉《澳門筆匯》第40期，2009年12月。
- (15) 含真等著，澳門一書齋，1992年。